

SW 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非 散



选集

SU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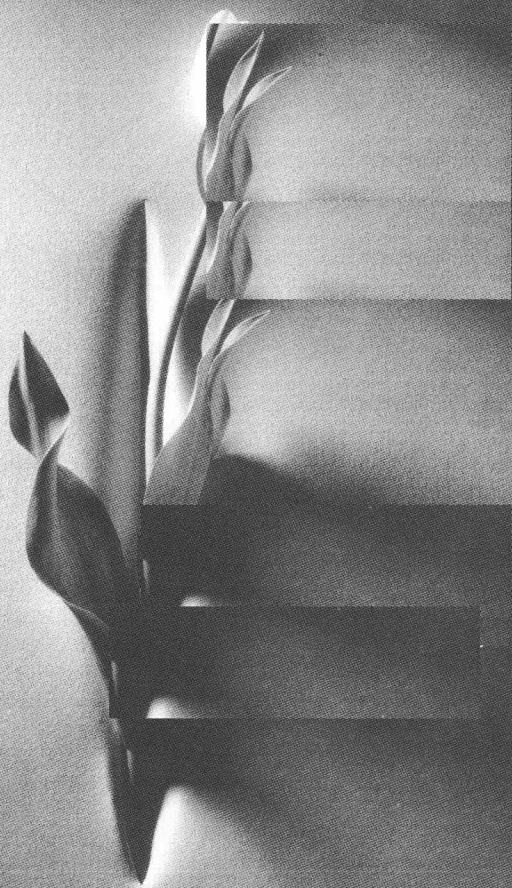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韩

非散文选集

萧华荣 选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韩非散文选集/萧华选注: —3 版.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6

(百花散文书系. 古代部分)

ISBN 978—7—5306—5402—6

I. 韩... II. 萧... III. 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战国时代 IV. I 263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629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2 字数 223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它和诗歌一样，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，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，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，特编辑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，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。

二、散文文体范围，代有嬗变，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，以抒情、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，下迄于清代。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，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，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、演变轨迹。

三、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：一为论文，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外，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，分析、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、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。一为散文，每篇均附加题解、注释。

四、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，以论文帮助

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,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,两相印证,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,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,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。

五、每书所选散文,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,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、风格的文学性散文,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。

六、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、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、出处、版本等外,还对作品写作背景、思想价值、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,加以简明的评述。

七、注释以疏解难字、难词以及典故、职官、器物、人名、地名等为主。对其重要者、用法特殊者,并援引出处或例句,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韩非和他的散文

知渊中之鱼者不祥。

——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

古之人难正言，故托之于鱼。

——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》

韩非的生活命运是一个悲剧，韩非学说的历史命运是一个悲剧，韩非作品的文学史命运也是一个悲剧。

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曾经引用过一句古老的谚语：“知渊中之鱼者不祥。”根据《列子·说符》篇的征引，这句谚语的完整表述应是：“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匿者有殃。”眼光过分敏锐，能够看得清深水中的鱼儿，那是不吉利的；头脑过分聪明，能够猜得透他人的隐私，那是要遭

殃的。这个古老的戒条真是不幸而言中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韩非整个悲剧命运的始因与萌芽。

韩非(约公元前280—前233年)生活于战国末期，七雄争鼎逐鹿的斗争已接近尾声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即将诞生。在他卒后仅十二年，秦始皇便统一了中国。韩非是韩国的“诸公子”，即宗室疏属。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比较弱小，又西邻强秦，成为秦东向问鼎首当其冲的猎物。韩非死后的第三年，韩国便被秦吞食了。

韩非口吃，而善著书。他曾师事著名的思想家荀况，与后来成为秦丞相的炙手可热的李斯是同学。韩非想以学得的“帝王之术”报效祖国，便多次上书韩王，建议实行法治，富国强兵。但昏聩的韩王不能采纳，却不料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，得到异国君主秦王嬴政(即后来的秦始皇)的激赏。韩非的文章句句拨动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心弦，决心把韩非弄到手，便加紧进攻韩国，迫使韩王派遣韩非以使者的身分居留秦国。然而，“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”。秦王对韩非尚未及任用，却招来那位同窗的嫉视。李斯深知韩非的才华高于自己，便罗织罪名，抓住韩非曾上书秦王“存韩”的小辫子，说韩非毕竟心向韩国，忠于韩王，终非掌中之物，说不定还是韩国的奸细呢，不如杀之，以绝后患。秦王听信谗言，把韩非关进大牢，李斯趁机下了毒手。一代才人与思想家，竟断送于自己的聪明！

韩非有一篇千古奇文《说难》，对君主的种种猜忌心理和“说君如说虎”的凶险，做了鞭辟入里、令人信服的条分缕析，真可谓“察见渊鱼”，而他自己却不免杀身之祸。

司马迁很同情他的这种悲剧，慨叹说：“余独悲韩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耳。”（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）秦王政是一位雄猜的君主，李斯是一位阴鸷的能臣，韩非本人又处于“韩诸公子”的可疑地位，对周旋于这种三角关系中的艰危情状，韩非原是洞若观火并多次论及的。但他终究是知之而不能行之的一介书生，而不是老谋深算游刃有余的政治里手，最终死于赏识过自己的君主和推荐过自己的同学手中，难道这不是一个聪明自误的苦涩的人生悲剧？

所幸他的著作留传下来，被后人辑为《韩非子》一书，共五十五篇，其中个别篇章可能出于其后学之手，而绝大部分是他本人的手笔。他的学说就保存在这些著作中。

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，韩非学说的核心便是法、术、势并用。法是公之于众的法令，术是驾驭臣下的权术，势是君主赖以威慑臣民的势位。其中最经常有效的手段是重赏严刑，这是君主手中的“二柄”和双刃刀。赏罚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农战。重农以富国，重战以强兵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。因此，凡是有碍或有害于农战的，诸如科学、艺术、道德、文章、儒生、隐逸、游侠、辩士等等，一切好看的徽号与好听的名声，统统都在疏远和弃绝之列。而上述一切，都建立在“人性恶”的理论基础上。他认为趋利远害是人的天性，可资利用。他用无情的眼光看待阴暗的人心，赤裸裸地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算计、争斗、倾轧与残害，甚至撕下夫妻之爱、父子之亲的温情面纱。他对那些争权夺利的统治者的卑劣情欲与恶行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。他本欲为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新的统一的封建

国家提供集锦方略，但他显得太聪明、太敏感、太“察见渊鱼”了，因而赢得“刻薄伤化”、“坏人心术”的千古恶谥，又铸就了身后的悲剧。

汉代以后，当标榜仁义道德的儒学最终夺得了思想上的王冠，韩非提供的统治术虽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和践行，却又阳儒阴法，反过来斥责韩非“惨礻少恩”。宋代理学兴起后，韩非之学更被径直斥为异端。韩非在《说难》中讲过，君主对有些策士常常“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”，不料韩非也正遭到这种命运，这不能不说是悲剧。

这种悲剧也殃及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韩非有文才，他的文章虽立意在说理，指归于政治，却处处闪烁着文学的光华。先秦诸子之作多富有文学性，孟轲、庄周、韩非尤称翘楚。三家风格不同，成就各异。韩非散文在有些方面，如文笔的犀利、譬况的繁富、结构的谨严、体裁的多样，有超越其他二家之势。古代的士大夫好用孟轲的“浩然正气”以自励，用庄周的“游于方外”以自高，而以韩非为急功近利、坏人心术。所以，推崇孟轲文章者不胜枚举，推崇庄周文章者多如过江之鲫，推崇韩非文章者则寥若晨星，仿佛推重韩非的文章就会显得心术不端，故连同其艺术性也一并讳言。这种情况，唯有在明代，特别在晚明是个例外，那时思想比较解放，重视文章技法的探讨，评点之风盛行，韩非散文的艺术技巧受到空前的重视与爱好。“明世诸儒嗜是书者，特艳乎文丽，以借作文之资”，甚至“珍为帐中秘也，靡不家习而户尊之”（见松皋园《韩非子纂闻》）。当时一些有名的文士墨客，如杨慎、王世贞、茅坤、孙月峰、凌濛初等，都曾为各种《韩非子》刊本作

序写跋，评鹭批点，给予高度评价。如王世贞赞其“峭而深，奇而破的”（《合刻管子韩非子序》），张鼎文美其“绝有力光焰”（《校刻韩非子序》），王道焜说“屈原怨而哀，韩非怨而愤，马迁怨而悲”（《重刻韩非子序》），把他与屈原、司马迁相提并论，把《韩非子》与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等量齐观。清代以后，对《韩非子》文学性的系统研究又比较沉寂。直至今日，对韩非散文的评价也似乎未提到应有的高度。

本文以下所论，侧重于韩非在文学上的独到成就，而与先秦诸子所同者，则尽量从略。

二

历来评韩非散文的总体风格，为“峻切”，为“犀利”，为“尖刻”，为“峭而深，奇而破的”，而对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，则语焉不详。其实，秘密首先还是在于他那能够“察见渊鱼”的无幽不烛、穷极心曲的明敏眼光，使他能够“切事情，明是非”（司马迁语），“切究情状，穷极事类物态”（吴汝纶语）。

说到“察见渊鱼”，我们不禁想起庄周的一则故事。庄周有次与惠施一起来到濠水的一座桥上，他说：“瞧那些鱼儿在水中从容游荡，是何等地快乐呀！”惠施问：“你不是鱼，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？”庄周答：“你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？”看来他也是能够“察见渊鱼”的。不过，他在鱼那里看到的是逍遥，是自由；而韩非看到的却是秘藏在心底的隐私、策划于暗室的阴谋。庄周要与“鱼”化为一体，泯没物我的分别，投入自然的怀抱；

韩非则与“鱼”判然为二，处于对立的地位，参与人世的事业。这是道家与法家之别、出世与入世之别。正是从此点出发，《庄子》与《韩非子》的艺术风格也分道而扬镳，一个上天入地，梦蝶化鱼，云谲波诡，表现为浪漫主义；一个则执著尘世，察微烛幽，冷峻切实，表现为现实主义。

但仅有“察见渊鱼”的眼光还不够，还要有揭示幽微的勇气。作为一名法家，韩非对于自己“惨礲少恩”的法治学说，对于政治斗争中的种种卑污、奸诈、勃谿、残杀等“人性恶”的揭露，认为是正当的，理直气壮的，并不存在什么“刻薄”与否的问题，因此他也就平心而论，无所顾忌。我们可以《五蠹》为例，这是他的代表作，全面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。这里仅摘几句断语：

上古竞于道德，中古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力气。

仁义辩智，非所以持国也。

且民者固服于势，寡能怀于义。

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

古者苍颉之作书也，自环者谓之私，背私谓之公。公私之相背也，乃苍颉固以知之矣。

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养耿介之士，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、削灭之朝，亦勿怪矣。

这就是所谓“斩绝纆刻”之文。其观点正确与否姑置不论，冷峻犀利、无所顾忌的文风则显然可见。

韩非散文的“刻深”还表现在：他能够纤毫毕现地剖析人们秘藏于心的微妙念头，特别是那些卑污的恶念，把

它们拉到光天化日下示众。这在《说难》中表现得尤为集中，因为《说难》原本就是教示策士们如何“知所说（者）之心”的。文章首先分析君主们有的“为名”，有的“为利”，有的“阴为利而阳为名”等心理类型，接着历数了十几种进说不当导致“身危”的情况，然后又从正面论述了如何迎合君主骄傲与虚荣之心进行游说，也达十几条之多。分析得细密中肯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文章宣扬不择手段，曲意逢迎，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在今天看来终究是不足为训的；但在客观上，却无疑把当时最高统治者那种自负、虚伪、奸诈、残忍、喜怒无常、表里不一等险恶的心理活动暴露得淋漓尽致，阴森可怖，以至千载之下的我们读来，犹不觉毛发悚然！

韩非十分善于描绘最高统治集团那种极端自私、相互算计的人际关系，有时简直是诛心之论，甚至令人觉得有欠“厚道”。如《备内》：

人主之患在于信人。信人，则制于人。人臣之于其君，非有骨肉之亲也，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。故为人臣者，窥覩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。……为人主而大信其子，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；……为人主而大信其妻，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。……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犹不可信，则其余无可信者矣。

因为要提防臣子的利用，所以连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，所以要“备内”，所以除自己以外世上无可相信者。封建的权力是一种多么腐蚀人的东西！古时帝王自称“孤

家”，自称“寡人”，这段话大约是最好的注脚。更有甚者：

故與人(车匠)成與(指官车)，则欲人之富贵；匠人成棺，则欲人之夭死也。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，人不贵，则與不售；人不死，则棺不买。情非憎人也，利在人之死也。故后妃、夫人、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。君不死，则势不重。

韩非的眼光未免过于无情，语言未免过于尖刻，但却合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人际关系的本质真实。翻开“二十四史”的帝王世家，子弑父、弟弑兄的闹剧不是屡见不鲜吗！

我们读韩非的散文，常觉得他如一个断狱的老吏、捉刀笔的师爷、握手术刀的外科医生，冷静，严峻，客观，不动声色，甚至冷峻到感情冰结的程度，但一旦讲到法术之士孤特无援、被刑就戮的情景，便禁不住兔死狐悲，把紧闭的感情闸门打开一个口子。如《孤愤》、《和氏》二篇，便是所谓“怨而愤”的文章。但从总的倾向来看，韩非散文的艺术风格毕竟以冷峻刻深为主，这是他独有的。他那“人心惟危”的露骨揭示与描绘，不仅为主“性善”的孟轲所无，为主“泯是非”的庄周所无，在整个封建后世亦所罕见，可谓千古绝调。

三

本文篇首还摘引了韩非的另一句话：“古之人难正

言，故托之于鱼。”这就是所谓譬喻、寄托、寓言问题。

先秦哲人好用具象思维，说理而不脱离具体形象，正如清人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所说：“战国之文深于比兴，即其深于取象也。”“比兴”、“取象”就是譬喻，而譬喻是有效地进行说理的需要。据说魏惠王曾对惠施说：希望你“言事则直言”，不要譬喻。惠施回答：如果有人问“弹”（弹棉花的弓）是什么样子，告诉他“弹之状如弹”，他就会不知所云；告诉他“弹之状如弓，而以竹为弦”，他就很容易明白。所以惠施总结道：“说者固以其所知，喻其所不知。”（《说苑·善说》）在当时人看来，以常见易明的事物喻说陌生难懂的事物或概念，才不至于陷入“以弹说弹”的困境。韩非所说的“难正言，故托之于鱼”，用心也在于此。譬喻有两种方式：一是以个别的形象之物为比，即现在所说的“打比方”；二是以有一定情节的故事来譬况、喻说、寄托，庄周称之为“寓言”，并说自己的作品中“寓言十九”（十分之九）。他所说的“寓言”，与现在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“寓言”内容不尽一致。根据王先谦的注解，是“意在于此，而寄于彼”的“寄寓之言”，比现在所谓“寓言”范围宽泛。这两种譬喻方式，韩非的作品中都被大量地运用。

“深于取象”、广作譬况，既是先秦诸子之文的共同特点，自非韩非所独具。但是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篇各论先秦诸子，独于韩非评为“著博喻之富”，说明他在这方面尤为引人注目。当时文章善于引譬连类的，莫过于《庄子》与《韩非子》，而后者更多于前者。这就使其文章富于文学性，富有文采，有花叶映发、枝叶扶疏之感。明代人

说的“艳其文丽”，大约就着眼于此。但作为韩非本人，他真是“夙愿何曾形色笑”！如前所述，他唯重农战，反对文学等不急之物。他在《外储说·左上》中曾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个楚国人卖珠，用“木兰之楛”盛着，外面还“薰以桂椒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辑以翡翠”，装饰得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，喧宾夺主，致使买主“买其楛而还其珠”。这个故事意在提醒人主对那些华藻的辩说，不要“览其文而忘其用”，不要“以文害用”。不料他本人的那些阐发“实用”的文章，为了使人爱读能懂，竟也缀以多得令人目眩的譬喻的“玫瑰”、“翡翠”，这其实是文学的胜利、艺术的胜利！这位反对讲究文采的实用主义者，竟被后人评为“艳”，评为“丽”，恐怕是他所始料不及的，也许这也未必不是他的一个小小悲剧！

在《韩非子》一书中，完全不打比方的文章不是没有，然而极少。他为了说明一个观点，往往要打一连串的比方，甚至比方中套有比方。有的文章以比喻开头，生发全篇；有的以比喻结尾，收束全文；有的通篇都围绕着某个比喻，虚实映衬。他的比喻不仅多，而且巧妙贴切，有时令人忍俊不禁，会心而笑。但善打比方并不是《韩非子》最突出的特点，《荀子·劝学》篇的比喻更为繁多，几乎占全篇的一半。《韩非子》中带有寓意性、托喻性的历史故事、民间传闻和寓言之多，才是他真正度越诸子之处。

韩非常常直接用故事、寓言解释、譬况某种观点。这主要见于以下三篇：一是《十过》，用十个历史故事分别说明他认为君主易犯的十种过错；二是《喻老》，用故事喻说《老子》中的若干论点；三是内外《储说》六篇，用将近二百

三十则故事说明“经”中的观点。如此巨大的数量，在先秦诸子中罕有其匹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《说林》上、下，共收录了七十余篇故事与传闻，文前既没有提纲挈领的论点，如《十过》、《储说》那样；文中也没有加以议论，如《喻老》篇那样，它纯粹是故事的汇编。有人称之为“寓言群”或“寓言集”，我觉得更可看作是早期的小说集（详后）。韩非自然是以他特定的倾向与观点看待这些故事的，但形象大于思想，读者自会见仁见智，各有会心。这些故事中不乏权术与阴谋，但也有许多表现出生活的智慧，发人深省，启人心智，直到今天仍有教益。

这一切，便是刘勰所称道的“韩非著博喻之富”。

四

韩非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哲人，也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散文作家。他有幸生于许多前辈哲人之后，不仅从他们那里汲取了思想的营养，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写作的经验，从而把散文的创作技巧推进一步。结构的严谨是散文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，只有到了韩非这里，才真正自觉地讲究篇章结构，才真正成为后世所说的“文章”。

这首先要从作品的标题谈起，因为它是全篇的主脑和核心。标题的发展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最早的诸子著作，《论语》是语录体，全书分若干篇，每篇由若干段互不相干的语录连缀而成，标题是从篇首的二三个字截取而来的，等于无标题，谈不上对全篇中心思想的概括，更

谈不上全篇的有机结构。《孟子》基本上也是如此，虽然各段的议论增多，篇幅加长，但仍然没有一个能够统帅全篇的标题。《庄子》只有少数篇章有概括性的标题，大多数则仍是摘取篇首二字，也不能笼罩全篇。在结构方面，他那些优秀之作，随着他放达不羁的意识的流动和幻想的驰骋，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，但这是“殆天成，非人力”，无规矩可按，无章法可寻，无步骤可学，不是文章的正格，一般人无庄生之才之志，是绝难仿效取法的。韩非发展了他的老师荀况的写作经验，除《爱臣》、《和氏》外，每篇都提炼出一个概括性的标题。这些标题惬意、醒目，有的还富有文学性。《和氏》的标题，其实也可贯穿全篇，甚至别有风味，是一种艺术性的散文标题。所以，严格说来，真正截取篇首二字为标题的，唯《爱臣》一篇而已。

韩非散文的结构紧紧围绕标题展开，严谨集中，中心突出；文中针线细密，层次明晰，前后呼应，成为有机的整体。除《说林》上、下限于故事汇编的体例外，其他均无澹漫之感。如《说难》通篇抓住一个“难”字，首句“凡说之难”开门见山，径直点题，接着从正面与反面、理论与实例反复论证进说之“难”，结尾“逆鳞”的比喻仍不离一个“难”字，并有余音不绝之感。文中每个层次都用“此不可不察也”、“不可不知也”、“此说之成也”等加以小结，既缝合了全篇，层次清楚，又造成一种“难”的沉重之感。《观行》篇首段讲如何观己，二段讲如何观人，结尾“以法术，观行之道毕矣”既点出题目，总结全篇，又突出了法家思想。一篇三百余字的短文，却用了十多个“故”字连接缝缀，如开头“古之人目短于自见，故以镜观面；智短于自